



ZHI

DE

AN FEN

智的安分

程念祺 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智的安分

程念祺 著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智的安分 / 程念祺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8.7
ISBN 978-7-218-12397-4

I . ①智… II . ①程… III 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 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5314 号

ZHI DE ANFEN

智的安分

程念祺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 版 人: 肖风华

策 划: 肖风华 向继东

责任编辑: 胡扬文

封面设计: 西门媚 梁淑怡

责任技编: 周 杰 吴彦斌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 话: (020) 83798714 (总编室)

传 真: (020) 83780199

网 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 刷: 广州市一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毫米 × 1092毫米 1/32

印 张: 11.5 字 数: 210千

版 次: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39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 (020-83795749) 联系调换。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

程念祺，1954年生，上海人，曾在黑龙江省呼玛县三卡公社插队十年，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完成本科、硕士学业。大学毕业后曾任职中学历史教员，硕士毕业后坐过一年半机关。后来到上海社科院，先后在经济所、历史所从事研究工作，任副研究员。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，著有《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》。自1992年起，时而在报刊上写一些读史随笔。写过几本通俗历史读物，如《话说中国》（秦、西汉卷）、《衰颓的年代——仁宣致治之后的明帝国》、《故事里的历史》。

序

收在这个集子中的数十篇读书随笔，最早的写于1992年，最晚的写于2016年。最早的那篇《道德的灾变》，是发在上海《青年报》副刊《开卷》版上的。编辑李韧常找陈克艰约稿，与我也渐渐熟悉了。一次与他聊起《万历十五年》这本书，就给他写了这篇稿子。从那时以来，偶尔因编辑约稿，会写一些读书类的随笔。现在，从前后二十多年写的这类文字中，选一些编个集子，又怎么才能起个合适的名呢！

吕思勉先生在一篇名为《论青年的修养和教育问题》的文章中，讲到人的“安分”分为两种。一种是“迷的安分”，一种是“智的安分”。吕先生认为，“一个人安于现状，却对于为什么安于现状，自己是茫然不知道的，此乃迷的安分”。我从小上学，一直到下乡插队，一直就是

懵懵懂懂的。插队的时候，人家招工走了，人家把户口迁回家乡了，人家办病退了，人家被推荐上大学，我都视若无睹。自己出身不好，以为一辈子要呆在农村，就连回家探亲也不愿久住。回想起来，那时候有很多时间，可以用来学习，而我却没有。我的很多同事、朋友，都是在“上山下乡”时，开始努力学习的。我却随遇而安，偶尔读书也并不用心。这就是由于这“迷的安分”所致。当然，这样也少了许多烦恼。

1979年，我总算考上了大学。大概由于“出身”不再成为问题，我竟一连三次参加高考。如此屡败而屡战，也要归功于我的“迷”。66年毕业的小学生，中学念了一年半，学的多是领袖语录和大批判文章，却非要考大学不可，不就是由于不再“安分”，而又执“迷”不悟吗！当时哪里知道许多人都在上山下乡时读了那么多的书。知道的话，是绝不敢考大学的。

如今，对于吕先生所说的“智的安分”，我也有些明白了，懂得了先生所谓“从全体中算出自己的分地来”的道理。回想起来，大学毕业后到中学当历史老师，以后读研究生，甚至坐过机关，然后到研究所工作，自己都没有过改行的念头，一门心思要研究历史，也可以说是“智的安分”使然。一样工作需要人去做，自己恰巧做了这工作，又是喜欢的，不就应该一直认真地做下去吗。吕先生说：“学问从来没有替个人打算的，总是替公家打算的。

替公家打算，就是所谓仁。所以不仁的人，决不能有所成就。”这样的话，读来让人感到亲切。多少年来，对于读书做学问，自己从未视之为“禄利之途”，也没有另去寻一个“禄利之途”的打算，从来都觉得研究历史，再聪明的人也不至于屈才，再笨的人也会有一点点成就，不也是一种“智的安分”吗。

我研究的是中国古代经济史，读书的范围则更宽泛些。收在这本随笔集里的，有些与经济史还有些关系，更多的则全不相干。它们都是我在“智的安分”中，因现实启发而生出的历史思考。那么，这个集子，就叫它《智的安分》吧。

程念祺

2018年4月于上海

素心文丛

策划 肖风华 向继东

何典 主编

《不够专业》

孟彦弘 著

《国家的计算》

西闪 著

《三声楼读记》

虞云国 著

《五库斋忆旧》

何龄修 著

《智的安分》

程念祺 著

《书中自有声色》

陈克艰 著

封面设计 西门媚 梁淑怡

目 录

人物与历史

吕思勉先生的通史旨趣与“史界声光” / 2

吕思勉先生的通贯史识与学问人生 / 12

陈寅恪史学之渊源与精义 / 31

王道政治的理想是如何被毁弃的 / 46

秦和西汉的史事与人物叙议 / 59

汉武帝与宫廷政治 / 78

西汉亡于宫廷，王莽亡于豪强 / 84

郑和下西洋：难解的中国历史之谜 / 94

废相之后明朝专制政治的走向 / 104

中国历史上皇权的持续强化 / 117

盐业，牵动历史的大局 / 131

被误读的宋朝“故事” / 140

美化商鞅变法有违史实 / 156

宋襄公的历史价值 / 170

商鞅的为人从政与战国风气 / 181

- “汉家儒宗”叔孙通 / 193
- 班固笔下的侠 / 205
- 周亚夫冤案的由来 / 217
- “狼虎丛中也立身” / 228
- 宰相赵鼎的悲剧性结局 / 244
- 刘基与朱元璋的政见分歧 / 259
- 汪文言与东林党案 / 274

读书杂识

- “西方中心”论视野下的城市史 / 286
- 贸易如何打造世界 / 294
- 道不同，不相为谋 / 302
- 道德的“灾变” / 311
- 一个书生的历史视界 / 315
- 激动人心的人生片断 / 319
- 阳明为什么要说“心即理” / 324
- 从《李自成》到《崇祯皇帝》 / 337
- 传神才是史家的追求所在 / 347
- 读书人的胸襟 / 353



人物与历史

吕思勉先生的通史旨趣与“史界声光”

“说明中国社会的总相”

我国老一辈史学家，不少都有写一部中国通史的愿望；而毕生致力于撰著一部中国通史者，仅吕思勉先生一人。然而，对于向来所谓历史的“资鉴”功能，吕先生是否认的：“世事亦安有真相同的？执着相同的方法，去应付不同的事情，哪有不失败之理？在社会变迁较缓慢之世，前后的事情，相类似的成分较多，执陈方以医新病，贻误尚浅，到社会情形变化剧烈时，就更难说了。近代世界大通，开出一个从古未有的新局面，我们所以应付之者，几于着着失败，其根源就在于此。”在吕先生看来，“资鉴”的历史观是向后看的，是照老样子做的历史观，

是导致失败的历史观。而吕先生的通史旨趣，在于通过研究历史，“用以说明现社会，因以推测未来，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”。惟其如此，对于“偏举一端，欲涵盖全史”的治史的方法，亦即用政治史涵盖全部历史的方法，吕先生是坚决反对的。他指出：“史学所要明白的，是社会的一个总相”；“社会，实在政治的背后，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”；“社会是整个的，虽可分科研究，却不能说各科研究所得的结果之和，就是社会的总相”。

基于这样的认识，吕先生强调：必须用各种社会科学的理论，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分别加以观察；而能够对社会进行“综合观察的，就是社会学”，必须用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对中国历史进行综合性研究，才能“说明中国社会的总相”。吕先生说，只有这样的历史，人们读了，“才会有革命的思想……，才知道人类社会有进化的道理。……从前的人，误以为读了历史，才知道既往，才可为将来办事的准则，于是把历史来作为守旧的护符，这才是误用了历史的。若真知道历史，便知道世界上无一事不在变迁进化之中，虽有大力莫之能阻了。所以，历史是维新的佐证，不是守旧的护符。惟知道历史，才知道应走的路；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；所当尽的责任。”

正是出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视，吕思勉先生甚至提出，应该在中学教授社会学，使学生对社会发展略知“匡廓”，以取代通行的历史教育。他以自己为例，说早年通

读二十四史一遍，却毫无心得，就是因为没有社会科学的根柢。但是，在中学教授社会学，毕竟只是一种设想。按当时教育部的规定，能够付诸实行的，只能是历史教育。于是，把社会学的理论贯彻于中学的通史教育，使通史教育成为国民教育，就成为吕先生通史旨趣的另一所在。他甚至建议中学历史教育，“不妨以社会学为之经，而历史转若为其纬，引社会学以解释历史，同时即以历史证明社会学之公例，两者如辅车之相依也”。

吕先生十五岁读史，七十三岁去世，五十八年间，写过多部针对不同读者的中国通史，如：《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》《更新初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》《高级中学适用本国史》《新学制高中本国史教科书》《高级中学用复兴教科书本国史》《高中复习丛书本国史》《初中本国史》《初中本国史补充读本》和《吕著中国通史》。这些通史，最早的出版于1923年，最晚的出版于1944年。而为了最终撰著一部能够说明“中国的社会总相”的通史，吕先生不仅在中国的断代史研究上下了大功夫，先后写出了《先秦史》《秦汉史》《两晋南北朝史》和《隋唐五代史》四部断代史，还对《宋辽金元史》和《明清史》的写作下了很大的史料工夫，并著有诸如《中国制度史》《中国民族史》，以及《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》《先秦学术概论》《理学纲要》等著作。今天，我们读吕先生的著作，无不钦佩吕先生学问的博赡，却也应该懂得吕先生学问的

博瞻，概由他的通史旨趣使然。要研究社会的变迁进化之理，要明白历史上中国社会的总相，没有学问上的博瞻，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？

“史界声光”

仅以四本厚重的断代史而言，吕思勉先生在史学上的贡献，当世的史学家中，即少有能与之比肩者。但长久以来，论名气，吕先生却远不及当时的其他史学大家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始有严耕望先生，将吕思勉先生与陈寅恪、陈垣和钱穆称为并世的史学四大家，并由此而论及吕先生的史界声光远不如另外三位先生的原因。严先生讲了三点，其大略为：一、近代史学风尚，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，发挥新意见，对于博通周瞻而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；二、学界风尚特别重视新史料，以新材料作为衡量史学著作的重要尺度；三、前辈史学家能享大名、声著海内者，莫不设教于其时学术中心北平的各著名大学，以声气相求，四方具瞻，又有较高素质的学生毕业后散布四方，高据讲坛，为之宣扬。严先生指出，吕先生学问上属于博瞻一途，著作主要取材于正史，且一直任教于并非学术中心的上海的光华大学，埋头枯守，默默耕耘，不求闻达，声光大不如陈寅恪、陈垣和钱穆等另三位史学大家是当然的。

吕先生做了许多深密的功夫

严先生的分析，讲的基本上是实情。在讲到吕先生学问的“博瞻”时，严先生还特别指出：“博瞻仍是为学大道。”但是，吕先生的学问是否就不够“深密”呢？如就“仄而专的深入研究”而言，吕先生的确不曾有过这样的“深密”。但是，为了能够成功地撰著一部中国通史，吕先生竟做了许多的深密功夫：四部断代史以及在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史上所下的史料功夫，是为中国通史的撰著，奠定了尽可能完整而系统的史料基础；而诸如《中国制度史》《中国民族史》的撰著，则是为中国通史的撰著确立框架，并进一步梳理、提炼史料和历史解释；至如《先秦学术概论》《理学纲要》和《中国政治思想史十讲》等著述，则意在弄清楚中国历史上与时代相关的思想。吕先生一生写过大量考释、考论性文章，上述大部分著作，就是在这些考释、考论性文章的基础上进行的。如先生《秦汉史》中关于秦汉的“儒学之兴”和“儒家之学”两节，即是吕先生有关汉代经学的大量考释、考论性文章的提炼。行文不到两万字，即把秦汉时期儒学的兴起、盛衰，其源流派别、风尚变迁和得失，讲得清楚明白。而后在《吕著中国通史》中，这些内容仅仅被概括为两千余字。

从官制变迁入手，揭示过度集权的弊端

一部《吕著中国通史》，其上编乃就中国文化的各个主要方面加以探讨，说明制度变迁的原因，以推求现状的由来；凡材料、布局、变迁过程、社会历史背景，乃至立论，皆有精审缜密的把握。如先生讲述中国历史上的官制变化，重在突出政治的变迁，并概括其基本过程：秦汉官制如何从列国时代蜕化而来，又因不适合统一时代而不久即生变迁，以及由此造成错杂不整，入唐后再被整理成为一种有系统的制度，却行之不久又不能适应实际，在唐中叶之后再生变迁，然后为宋朝所沿袭，入元又加入了一部分异族因素，再为明朝所沿袭，清朝又大略沿袭明朝，至末叶因政体改变，官制随之再变。至于在这样的过程中讨论历代官制的具体变化，吕先生则通过历代内官（中央官制）和外官（地方官制）的设置及权限变化，讨论各不同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和政治特点；而以内官“分事而治”、外官“分地而治”为线索，讨论历代官制变迁中的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升降变迁，以及官制设置不合理而造成的行政阻隔和影响。高度的概括，结合具体的分析，是吕先生撰述通史的一个特点；而与此特点结合在一起的，则是深刻的史识。如针对外官权限被侵夺的问题，吕先生指出：“上级权威愈大，下级的展布愈难。积弊之深，和末造中央威权的不振，虽有别种原因，官制